诗中花事

采 药

今年春天来得早，才过春节，气温陡升到二十几摄氏度，左近的樱花就毫不客气开起来了，真有其兴也勃焉之感。

正当树龄的樱花之盛，远出乎我意料，每日出门，但见花干树，目不暇接，只是这些行道树往往栽得刁钻，不好接近拍照，只能远远地看着。

其后，又是降温又是风雨，我总担心花落光了，然而樱花却越开越热闹，好像先前还故意留些余地，等着后来的桃、李、杏花，如此一来，早春便不寂寞。

花事一盛，前人咏花的名句会凑巧涌到心里来，我自幼未能“多识草木鸟兽虫鱼”，深以为憾。唯独因为馋，对花名久著的几种果树颇具好感。以前水果稀罕，且不及现在品种好，桃生李涩，杏子发酸，但从开花时盼起，足足盼上几个月，果子还未及成熟，早有馋虫立上头。或许是等太久的缘故，再不好吃的东西，经过一番脑补，个中滋味也远超过果子本身了。

早先古人对于桃、李的认识也很质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本旨，着落在“宜其室家”上，看中的是桃子能结出大果子。至于人们熟知的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摆明了也是冲着吃果子来的，最初发明这句话的人，想必是个老实且俏皮的馋猫。

唐诗宋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则一代亦有一代之花事。唐人重牡丹世所周知，不少诗人都题过牡丹诗，然而牡丹价格昂贵，白居易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非寻常人家所能消费得起。

受流风所及，刘禹锡也写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却远不及他的两首桃花诗有名。他元和间贬官十年后返京，写过“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有讽刺的味道，当时人居然一读就懂，刘禹锡因此再度贬官十四年，等他回来之后，玄都观里连桃树都没有了，他才又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史书记载说，因为这两首诗，时人对刘禹锡的态度颇为矛盾，“嘉其才而薄其行”，这种评价只有唐朝人做得来，一则要能看出诗中的妙处，二则要能品味其中的深意，换一个时代难免就隔膜了，一个人贬官二十多年，人生的黄金阶段全浪费在烟瘴之地，写两首诗又算什么刻薄呢？

宋人有簪花的习惯，连古板的司马光也“闻喜宴乃簪一花”，只是没说清楚戴的是什么花。王安石梅花诗天下知名，他似乎还喜欢丁香，曾作为礼物送给好友，然而宋代关于春天的好诗，几乎都集中在杏花上，不得不说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开了个好头。

及至南宋寄都临安，杏花这种江南随处可见的物事，更成了春意的代名词：“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正可见一时风味；别致一点的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妇孺皆知；就连僧人也能作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样富有禅意的句子，有了诗人的观照，杏花由此增添了几许灵秀的味道。

据大儒朱熹回忆，南宋高宗最激赏的诗句，是陈与义的“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以诗而论，宋高宗品位确实不俗，他或许将杏花的象征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毕竟身为洛阳人，陈与义还写过“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但多半被偏安一隅的宋高宗选择性忽略了。

近人还有一联诗写杏花，“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游人”，化用刘禹锡桃花诗而另出机杼，故而成为警句，实则从植物学上说，桃、李、杏以及樱花，都属于蔷薇科李亚科，算是近亲，花开绝艳的架势也相同，这种大俗大雅的开法，须臾之间尽态极妍，仿佛不嫌累似的，着实令人心疼。

诗人以花入诗，一开始着眼的也许是实景，所以画面感强，然而再经高手解读，别生姿态也是常有的事。苏东坡名句“倚天照海花无数”，经曾国藩接续王安石诗句“流水高山心自知”，集为联语，重新演绎为阐明心意的经典之作，以至于人们常常忘却这句诗原本是写桃花的。

无论如何，春天是一定要有花的，“江南四月，杂花生树”，看过满目繁花之后，再去考虑“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境界，也不为迟。

心事重重度流年

匡笑余

小时候从来不知道还有一个大外公，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封从宝岛台湾来的信漂洋过海几经周折终于漂进了解放街73号，才引出一段被湮没的故人往事……

在我爸书写的回忆录里，关于我的大外公，有如下文字：伯岳父忠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跑到三多寨招兵点卖了壮丁，每月的津贴费均寄回家中。后随部队撤至缅甸开荒种地。约两年后去台湾。未发养老金前，靠卖小菜、打工谋生。

大外公偶尔也会说起他数十年来的经历，像是在给小孩子讲大人的故事，又像是在向家乡做记忆汇报，有时候又像个说书人而不是经历者，比看客都眉飞色舞，好像只是他听来的一般。数十年漂泊流离怀乡，种种经历恐怕早已让大外公有了一颗“嚼得菜根，百事可说”的心了。那时候我还念小学，还没有资格坐到大人的酒桌旁与他们一起把酒言谈，不知道大外公有没有也情到深处唏嘘感慨的时候呢？

大外公身材高大，即使老了脊梁也挺得笔直。回来探亲期间，他会以牛佛为根据地，在几个侄女家轮流玩耍。据我观察，他和外公两兄弟唯一相同的爱好就是打麻将。所以不管去到哪儿，外公一定陪伴左右。除了陪多年不见的大哥，还有牌打咧！

大外公来我家的时候，吃完晚饭我会扶着大外公去外面散步。

就只有我和大外公走在他离开了数十年的乡间的小路上。那时候的乡间真的还是乡间啊。

农村人家吃得晚，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他们的炊烟才刚刚升起，弥漫在乡土田野，就是故乡故土的气息。那是夏天，有晚归的牧童和哞哞叫着的大水牛，遍野的油菜花里是蜜蜂嗡嗡的叫声，路上三三两两的农人或荷锄或担犁，再不济也背个背篼，吸着烟卷或叼着烟杆，走在各自炊烟升起的路上。一条废弃的石子马路通向一个废弃的盐场，经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池塘，有蛙鸣，有路边村庄大人小孩的喊叫，还有晚风吹动竹林，竹叶沙沙的声音。如今许多年过去，我和当年的大外公一样，离乡背井，再也没听见那熟悉的竹叶沙沙声了。

2006年，家里把电话打到广州，告诉我大外公已在台北去世的消息。我放下酒抓过吉他，就写出了《夜航船》的前奏。这些隐约而缥缈的音符，在我心里就像茫茫大海上无星无月、不辨方向不明就里孤独的摇橹声。而这摇橹声，是漂流在外的人唯一的温情唯一的依托，也是唯一的指引：

穿过数十年的风/穿过数十年的浪/你看他艰难地摇啊摆啊/像谁的身体

穿过窈窕的淑女/穿过写意的少年/穿过八千里路云和月/穿过所有人的思念

是谁风雨回故乡/是谁远扬他方/是谁在横亘千载的渡口/频频眺望

是谁兜兜转转/是谁孤单地回航/是谁艰难地闭上眼睛/在夜航船上

——《夜航船》（收录于秘密后院专辑《弟子归》）

我写“穿过数十年的风，穿过数十年的浪，你看他摇啊摆啊像谁的身体”，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就会知道，呀！原来风是那样的风，浪是那样的浪，而身体，原来是那样的意思。而“淑女”与“少年”，他们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追逐里，又汇集成的是怎样的思念呢？总有些歌词是穿越你小小的天地，飘扬在世情之上的。你不知道的时候，风浪就是眼前的风浪，你知道之后，才明白风浪原来可以穿透时间拍过人间。

行文将尽，总有一个画面飘荡在我脑海里。那是1988年，离乡背井了无音讯数十年的大外公终于又站在了他熟悉的沱江边牛王山下，看着隔岸来接船的失散多年的兄弟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神情呢？半个世纪的光阴都已过去，当年被一艘小船摇走的人，如今又将摇着一叶小舟归来。早生华发啊！所有的时光所有的苦难艰险所有的少年心气赤子情怀，都遗落在这一江故乡的水面，不着文字，只得风流。

而那墓穴里的更苍老的人啊，看见这少年兄弟老来逢，即使苦涩的笑，也总算圆满！

油炸的香气

默 音

家附近的大饼油条店消失了，让人惆怅。

朋友小C不能理解我对油炸食品的热爱，毕竟那是个在日本餐馆把天妇罗的薄衣剥掉的人——边剥边小声问，你说厨师会不会打我？目睹这一幕之前，我原以为油炸食品是没有国家民族界限、无论男女老少都爱的好东西。人与人的差异存在于各个方面，难怪王小波多次谈论“此人之药彼人之毒”。

不过，如果这世上有所谓大多数，我想大多数人都喜欢食物经过油炸后的香和脆。在日本旅行，有时遇见小城僻静的街角挤满了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不用说，多半是一家肉店，出售热腾腾现炸的可乐壳。可乐壳这个词来自法语的croquette（炸丸子），做法是往土豆泥中掺入炒熟的肉末，捏成团，沾面粉，裹蛋液，再滚上一层面包粉，然后进油锅。肉末的存在感微弱，主体是土豆。好吃的可乐壳，用的油应该是勤换的，壳脆，馅温软，有股饱满的精气神。

看见聚集在肉店橱窗口的小学生，小C摇头说，现在的小朋友总吃油炸食品这种快餐，味觉都搞坏了。我不理会，往队尾一站。

说到这里，诸位也许以为，只要是油炸的，我都会无条件地热爱。倒也不是。多年前第一次去日本出差，客户招待我们去了浅草一家著名的天妇罗盖饭。天妇罗的衣有厚薄，那家是偏厚的路数，肥厚的面衣吸满了偏甜的酱汁，刚入口时还不错，越吃越腻。配的腌萝卜只是象征性的几片，让人无比想吃蔬菜。我以为，油炸的东西最适合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当点心填肚子，如日本的可乐壳、上海的萝卜丝油墩子。当作正餐而且还是唯一的主菜，就有些过了。

不过，油条拥有早餐的一席之地，大江南北可见各种搭配，豆浆、稀黄粉、胡辣汤……最近一次吃到现炸的油条，是在延吉的水上市场。仓库模样的建筑内排列着一家家汤饭店，店门口的摊子摆满了各色面食和打糕，让人眼花缭乱。吃过汤饭出来，看见油条摊，摊主是一男一女，男的揉面，两根小面棍一搭，扔锅里，女的麻利地用长筷子拨动，将炸好的捞出来晾在网架。油条又胖又大，看着就香。我看了片刻，发现此地的油条是称分量的，便称了一根，两元四角。回到酒店，配咖啡吃了半根。

我每到一处都欢喜地品尝当地的油炸食物。西班牙的咖啡馆提供churros（西班牙油条）当早餐，我一口气吃了三枚。小C表示“看着都腻”。有一天，大概为了表示友爱，这位反油炸人士从网上给我买了南京著名的炸藕圆子。我有些哭笑不得，油炸，当然要吃现炸的。不好辜负对方，我用烤箱重新加热。小C问，怎么样？我说，没了灵魂的躯壳，随便吃吃吧。

冬去安好，春来欣然

马俊利

只愿冬去得安好，春来得欣然。

习惯了冬天的清寂，觉得日子这样过，也挺好。天空灰蒙蒙地安静。光秃秃的树枝上压着几只褐色或麻灰的鸦雀，乍一看以为是未及零落的枯叶。偶尔的一两声鸣啾，把我的神思拉回现实，待要专注看时，瞬间又扑棱棱飞走，树木又恢复光秃的本来面目。

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着这些树木之前是多么茂盛，也曾繁花似锦，绿叶如织。就连经脉里流动的血液，都是沸腾的；就连挥发出的草木气息都像酒精似的，带着鲜明的醉意。如今孤独地挺立在旷野，神情沧桑而沉郁。

我仍喜欢这繁花落尽的冬天，褪去浮华，风骨尽显。沉沉的缄默与隐忍，一直都在心里，无需告知他人。相信茫茫人海，终有一两个明白的人，是相知，真懂得。于是，心是安的，也是静的。

时光在游走，不知疲倦。去向哪里，未知。知道的是一定不会回头。

不知什么时候，空气中有了淡淡的暖意。东风轻抚面颊，抬眼处，柳枝柔柔地摆动。不确切是哪一天，有细碎、零星的迎春花张着迫不及待的明黄笑脸对着休眠的草木喊话：“醒来吧，又一春啦！”

又一春啦，只是这一春并不是那一春，虽然似曾相识，却实在是崭新的。在新旧之间，有着对过去的不舍，对未来的希冀。只愿冬去得安好，春来得欣然。这样想着，心底里那丝淡淡的伤感有了柔柔绿意，渐渐延伸开来。

樱（插画） PP殿下

牢不可破的信仰

田海涛

父亲的遗物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和《党员干部简历表》是我最为重视、保存最好的家庭史料。纸张粗黄、右下角标注页码（共8页）的登记表，在封面上印着粗黑的繁体字“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下面的姓名栏里有我父亲田云樵的签名，日期栏写着1952年。封底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翻印。封二是说明，第一项说明写着：凡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均须填写党员登记表。党员登记是共产党员的神圣责任，是对组织忠诚的体现。表格上有“入党动机”和“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何认识”两栏，填写这两栏是对当初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回顾，是对参加革命初心的追寻和重温。

父亲珍藏的是一式两份中他留底的那一份，虽然这份留底的登记表经历了近70年的岁月销蚀，字迹也有些模糊，但它还是清晰地记录下了父亲从1931年在山东加入共产党以后的人生轨迹：他被调往上海、北平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又到延安抗大学习过，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过，解放战争期间被派往上海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1949年后他被分配到公安局社会处。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走过的历程就如同中华民族解放大潮中的一滴水珠，就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战士形成了滔天巨浪，席卷了中国大地，民族解放革命得以成功。

另外，这份登记表也可以看到父亲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1932年底，父亲所在的中共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的追捕，为了掩护省委书记任作民（任弼时的堂兄），切断敌人的追捕，父亲连夜转移到上海。第二天敌人上门包围搜查，已经人去楼空。

1936年3月，父亲再次来到上海。他于1933年从上海派往中共北方局，奉命在北平市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后来中共北方局被敌人破坏，秘密联络站失去了组织关系。为了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父亲几经辗转以李一凡的助手名义来到上海。李一凡到上海创办《文化报》，父亲一边做助手，一边去党内联络点寻找熟悉的党内同志，可惜他处处碰壁，秘密联络点早已面目全非，人员全部转移了。

李一凡常去鲁迅家约稿，父亲也一同前往，他试探性地与鲁迅先生交谈，希望鲁迅先生能够帮助他联系上组织关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向来警觉的鲁迅先生明确表示了困难。

后来，父亲历经周折，奔赴延安寻找到党组织。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李一凡（真名李竹如）其实也是共产党员，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李也失去组织关系，正在积极寻找党组织，但他俩严守组织纪律，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

1937年，他们又分别赶往延安寻找党组织，同在八路军抗日前线，我父亲在115师，李一凡在129师。1942年11月，李一凡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当时他已是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彼此终生不知对方是中共党员。2014年9月，国家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就有革命烈士李竹如（李一凡）。

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虽然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失去了党组织关系，但是他们的信仰是牢不可破的，他们的意志是百折不挠的，他们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一定要为理想奋斗。

1946年，父亲再次被派往上海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就此了解上海、熟悉上海、热爱上海。

1949年后，父亲就在上海工作，成为新上海人，直至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

十日谈

寻找100份红色记忆

责编：王瑜明

从家乡逃亡四年多后，外婆送13岁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